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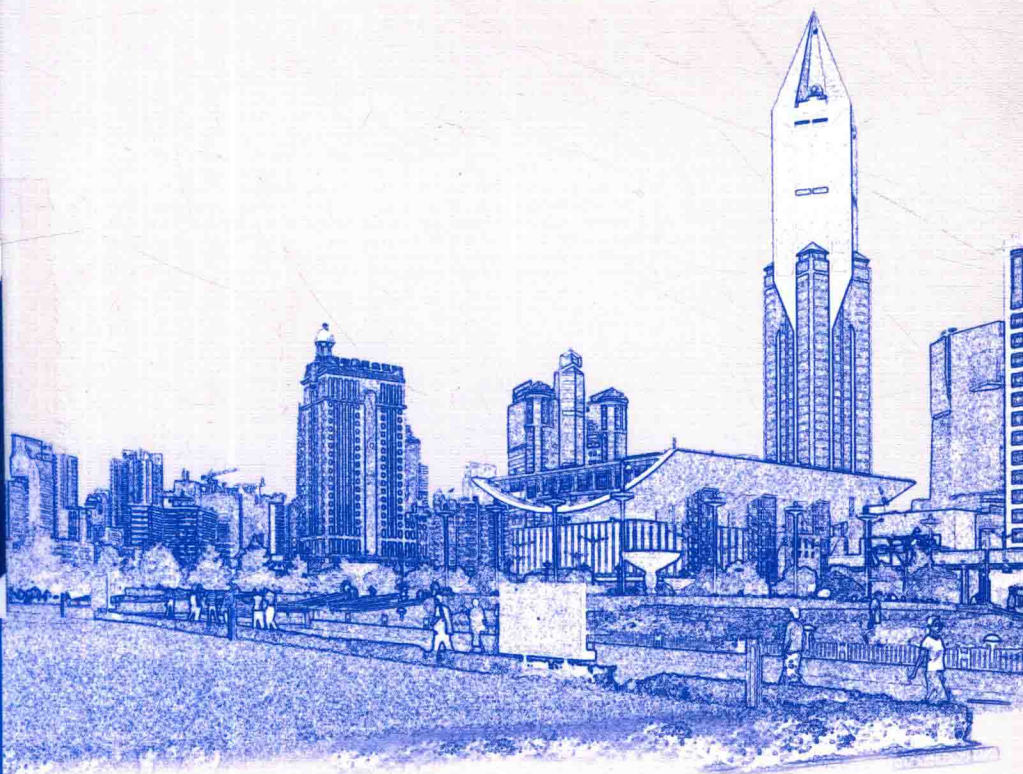


智媒时代的新闻传播研究系列丛书

# 空间可沟通性

传播视角下的上海人民广场研究

钟 怡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智媒时代的新闻传播研究系列丛书

# 空间可沟通性

传播视角下的上海人民广场研究

钟 怡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可沟通性:传播视角下的上海人民广场研究/钟怡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2

(智媒时代的新闻传播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16119-9

I. ①空… II. ①钟… III. ①城市空间-传播学-研究-上海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20390号

空间可沟通性:传播视角下的上海人民广场研究

KONGJIAN KEGOUTONGXING; CHUANBO SHIJIAO XIA DE SHANGHAI  
RENMINGUANGCHANG YANJIU

钟怡 著

责任编辑/刘畅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86-21-65104505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78 千

202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6119-9/G · 2346

定价:46.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导论	001
第一节 理论视角与研究对象	002
第二节 对核心概念“可沟通性”的界定	022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全书脉络	033

## 第一部分 空间改造与可沟通性的变迁

第一章 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空间嬗变与传播实践	041
第一节 作为媒介的跑马厅：再造西方交往场景	041
第二节 1951年的大改造：从“集体空间想象”到“集体主义空间”	055
第三节 异质性的全球城市广场：人民广场的再改造	072
第四节 改造和传承：历史的空间呈现	087

## 第二部分 媒介、人民广场与传播实践

第二章 作为实体空间的人民广场和公共生活	101
第一节 政治节点：静态的象征与特定时刻的显现	101
第二节 “广场芭蕾”与“亲切经验”：老上海人的社会交往空间	109

第三节	地下交通空间对人民广场的再形塑 .....	117
第三章	多元建构：广场形象的塑造 .....	129
第一节	大众媒介对人民广场的建构 .....	130
第二节	无广场之广场：对大众媒介建构的再解释 .....	139
第三节	新媒介建构：个体的“可见” .....	150
第四节	大众文化对人民广场的建构 .....	160
第四章	虚实相嵌：作为动态流动空间的人民广场 .....	173
第一节	从报廊到手机：媒介在人民广场的嵌入 .....	175
第二节	个案分析：作为媒介的相亲角与相亲角中的 媒介 .....	187
第三节	个案分析：穿梭在虚实之间——以上海历史 博物馆为例 .....	196
结论	城市空间与可沟通城市——媒介融合的视角 .....	204
参考文献	.....	210
附录一	论文访谈对象情况列表 .....	219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222
后记	.....	229

## 导 论

本书的写作源于对当代中国建设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的愿景。

在古希腊城邦生活中,城邦内的实体空间无疑是推动城邦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模式。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连接和沟通成为常态,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实体空间在社会交往中的不可替代性开始受到争议。吉登斯用“脱域”生动地阐释了媒介技术作用下社会关系的构建与地域性关联之间的脱离;梅罗维茨指出,电子媒介弱化了社会交往、社会行为与物质地点之间的关联,他用社会地点来形容上述行为发生的场景,由此认为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在电子媒介的作用下得以分离;卡斯特指出,“电子通信与信息系统的发 展容许日常生活功能的运作,逐渐与空间邻近性失去关联”<sup>①</sup>,因此他提出疑问:这是否意味着城市的终结?实际上,回到真实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城市空间的意义并没有因为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而消弭。一方面,城市越野、城市马拉松、城市漫步等各类依托于城市空间的实践活动在近年来持续火爆;另一方面,伴随着移动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签到”“打卡”

---

①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

等活动,更是凸显了媒介技术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密切互动。

本书的研究对象——上海人民广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上海的城市心脏,同时也是上海市地理位置的零公里所在地,被称为“上海零点”<sup>①</sup>。当前的上海人民广场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旅游和交通等于一体的结构丰富、功能多元的城市空间。本书选择这样一个城市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如果以建设可沟通城市为愿景,作为传统城市沟通形态的城市空间在全球化、城市化、媒介技术的迭代等众多新趋势的交汇中,其空间形态、传播实践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城市空间的可沟通性呈现出什么特征?城市空间对建设可沟通城市具有什么意义?

## 第一节 理论视角与研究对象

### 一、传播视角下的城市空间

空间最早被认为是一种虚无和容器,即一种不可感知的、脱离社会环境和社会活动之外的物质,它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非一种社会创造出来的结构<sup>②</sup>。伴随着研究者对空间的认识的深入,空间的社会性逐渐被挖掘出来,这为后来者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空间问题提供了契机。由此,人文社会学开始出现一种“空间转向”趋势。“空间转向”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① 熊月之、严斌林:《上海零点人民广场》,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5页。

② [加拿大]罗伯·希尔兹:《空间问题:文化拓扑学和社会空间化》,谢文娟、张顺生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0、23页。

“空间转向”出现于 20 世纪中后期,但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初,齐美尔就已经关注到空间在物质和社会两个层面都具有意义。齐美尔认为,在物质层面,“物体在空间中处于无情的排斥之中,没有一个物体部分跟另一个物体部分共存于一个空间”<sup>①</sup>;在社会层面,他指出,“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而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sup>②</sup>。

福柯提出了空间权力批判的思想<sup>③</sup>。比如,他在论述监狱的构造时,认为全景敞视建筑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多数监狱设计方案的建筑学纲领,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使建筑物最直接地向权力机构敞开一切”,即全景敞视建筑的每一个环节设计都是为了监视的准确和便利而服务的<sup>④</sup>。

列斐伏尔在福柯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空间的社会性,进而为促成人文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认为,空间是由一种在某个(社会的和被决定的/决定的)空间实践里布展的力量(生产力)所生产的<sup>⑤</sup>;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sup>⑥</sup>。

索杰继承了福柯和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并概括出了“第三空

① [德]G. 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宇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1 页。

② [德]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1 页。

③ 冯雷:《理解空间:20 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4 页。

④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79—280 页。

⑤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建筑学》,刘怀玉、罗慧林译,载于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 10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4 页。

⑥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载于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7—58 页。

间认识论”。他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空间认识论偏重于关注“空间形式具象的物质性，可由经验描述的事物”；第二空间认识论“在空间的观念之中构思而成，缘起精神或认知形式中人类空间性深思熟虑的再表征”；“第三空间”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发端于传统二元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然而也在范域、实质和意义上超越了这两种空间”<sup>①</sup>。

地理学者哈维也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空间，他提出了理解空间的三种方式：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空间。其中，绝对空间独立于物质存在，相对空间可以被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关系空间则是将空间看作内嵌于物体的存在<sup>②</sup>。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强调城市空间对城市的重要价值，认为城市人的特质展示在城市多样性的空间里，甚至在那些圈占起来的由社会管理或由私人 and 公共（或国家）利益共同占据的空间里。他还试图从“资本主义出发理解城市进程”，认为城市空间应当是一种共享资源，但现在的城市空间却“处于国家权力和公共行政的管辖范围之内”，或是被“资本化”了，因此出现了大量“占领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活动<sup>③</sup>。

马克·戈特迪纳提出了“社会空间”的观点，强调社会和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对城市空间的考察置于一个更大的大都市

---

① [美]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② [美]大卫·哈维：《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付清松译，载于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67页。

③ [美]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3—75页。

区域内。因此,来自大都市、全国甚至国际层面制定的决策,都会影响地方范围的福祉。空间安排可以同时以可预言的方式和没有预期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行为和互动,个体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 and 与其他人的相互影响,改变现存的空间安排并建构新的空间<sup>①</sup>。

上述研究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从原有的单一的物理介质推向多元化,并且启示本书从社会性视角来审视城市空间。秉承上述对空间的基本认识,结合已有的研究文献,本书认为,从传播学角度切入城市空间,主要可以从物质实体空间、媒介表征空间和媒介融合空间三个维度展开研究。

**聚焦城市实体空间的传播学分析,主要关注其在实体交往层面和表征层面的意义。**

城市规划学科早已言明,城市实体空间对人们的公共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好的城市空间设计应该对人们的社会交往具有积极意义。例如,著名的丹麦城市规划师扬·盖尔认为,物质环境以及功能性、社会性的空间处理能够拓展或扼杀社会交往发展的机会,所以物质环境设计应该为更加广泛的交往机会创造条件<sup>②</sup>。在他看来,大到城市尺度、建筑物密度的规划,小到户外休闲座椅、照明设备、遮阳棚的设置等,都对城市空间中交往活动的发生和持续具有重要的影响。

城市人类学也关注到交流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密切关联。例如,苏珊·史密斯在研究中将城市视为一个舞台,使用情节、剧本和表演的概念,描绘了发生在英国城市伯明翰的中心区的一场偶

① [美]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第四版),黄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5页。

② [丹麦]扬·盖尔:《交往与空间》(第四版),何人可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然事件。肖特对此分析后指出：“空间不仅是背景，空间和地点对于给出何种表演以及该表演如何被接受也至关重要。”<sup>①</sup>

库蕾对古希腊城邦的研究则展示了城市实体空间丰富多元的传播意义。克琳娜·库蕾在书中直接指出，古希腊的沟通的本质并不能从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公共性等理论脉络上讨论，而应该从古希腊最大的社会特征——城邦入手，城邦决定了古希腊的交流结构<sup>②</sup>。她以古希腊城邦中的广场、圣殿、体育学校等为例，认为这些场所是展开研究的重要立足点。例如，由于广场这一空间的存在，城邦中的商谈、散步、宗教仪式、政治机会等才成为可能；圣殿为人与神的交流，以及社团活动、纪念活动等提供了空间等。

与此同时，在已有的研究中，城市还被广泛地视作一个可供阅读的文本，而城市实体空间建筑就是阅读城市、理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实体建筑空间不应当仅仅被视为承载城市公共生活的功能性场所，它对于城市的文化表征意义也应当被看到。与在城市中展开的各种活动一样，城市建筑也是表征城市特性的标志<sup>③</sup>。

这样的思想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领域早已被广泛认同。城市规划研究者凯文·林奇在 20 世纪中叶就提出，城市规划要关注“可意象性”。“可意象性”指建筑物物质环境中蕴含的对于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他认为，城市是供众多背景

① [英]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6—279 页。

② [法]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③ [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7 页。

千差万别的人享用的,因此,城市如果要适应将来的发展需求,在城市规划中就要注重意象的物质清晰性,允许意蕴自由发展<sup>①</sup>。贝淡宁和艾维纳则认为,城市建筑的设计和规划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并且足以影响城市的气质和人们对城市的感知<sup>②</sup>。诺伯舒兹将场所精神作为核心论点。场所精神指的是利用建筑物赋予场所特质,并通过这些特质与人形成亲密的关系,使人们在具体的日常感受中归属于某一场所,拥有在世存有的一个立足点。基于此,他认为,仅仅建造实际的建筑和城市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通过建筑将场所精神具体化<sup>③</sup>。段义孚提出“地方”的概念,用以与“空间”形成区分,“地方”强调空间蕴含的价值、情感和意义等<sup>④</sup>。在段义孚看来,城市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意义中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象征物,这些象征物帮助城市建立起卓越的秩序<sup>⑤</sup>。

空间表征性的发扬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以上海外滩为例,孙绍谊的分析指出,相较于建筑本身带来的直观物质体验,外滩万国建筑内在的指涉和象征意义更值得玩味。他指出,传统中国建筑美学一般以水平铺陈为特质,但外滩建筑群却以垂直性、矛盾性等特点改写了中国人的空间观。与此同时,外滩建筑群又以僭越传统景观的逻辑刺激着遭遇者的想象,赋予其震惊、称羨、新

①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② [加拿大]贝淡宁、[以]艾维纳:《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吴万伟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③ [挪]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④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110页。

⑤ 同上书,第143页。

奇、惑疑的繁复体验<sup>①</sup>。孙玮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外滩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媒介，它因现代性的交流本质而生成，随着时间的流转，外滩象征的文化扎根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实现了实体空间作为媒介对于都市的意义<sup>②</sup>。

聚焦媒介表征空间的传播学分析，主要关注不同的媒介对城市空间的再现和建构。

“城市不单单是物质或生活空间，还是想象和再现的空间。”<sup>③</sup>城市具有多元、复杂、神秘、刺激等诸多特质，这一切都吸引着文学、艺术、电影、媒介等诸多领域对城市的再现。尤其是在媒介技术发达的当下，人们对城市的感知再也离不开媒介对城市的再现和建构，“媒介城市”成为现实<sup>④</sup>。麦奎尔（也译作麦夸尔）将媒介对城市的表征称为“表征范式”。

本雅明呈现了“城市漫游者”这样一种“自由穿行于城市街道马路，并通过自由的走动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个人观感暂时颠覆城市体系的支配”<sup>⑤</sup>的城市个体。最重要的是，“城市漫游者”将对城市景观的体验和感觉转变为话语，从而对都市空间原有的意义发出挑战和予以重构<sup>⑥</sup>。本雅明的“城市漫游者”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前，诗歌、小说、散文等文艺形式对

① 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

② 孙玮：《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新闻大学》2011年第4期，第67—77页。

③ [英]加里·布里奇、索菲·沃森：《城市概论》，陈剑峰、袁胜育等译，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④ 张伟博：《媒介、建筑与空间视角下的城市形象传播研究——以南京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20年第12期，第106—111页。

⑤ 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⑥ 同上。

城市空间的再现和建构机制。

大众媒介出现之后,报纸、广播、电视通过不同的方式再现和建构了城市空间。其中,城市形象片是大众媒介时代媒介表征城市空间的一个典型案例。城市形象片运用影像技术集中再现了城市中的多种空间建筑,从而实现了对城市意象的塑造和对城市精神的建构。与文字时代的城市漫游者不同,影像技术对城市空间的再现往往是在视觉上对城市空间进行再加工,通过视角转换、拼贴组合、特效渲染等方式,赋予城市空间以一种崭新的视觉效果。例如,苏州城市形象片《家在苏州:一座诗意栖居的城市》利用水墨动画的形式对苏州地标进行技术处理,借此凸显了苏州的诗意<sup>①</sup>。

伴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对城市空间的表征形式越来越丰富,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微博、微信、抖音等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个体也开始参与对城市空间的再现与建构,通过打卡、直播等方式,网红景点层出不穷。以抖音为例,平台用户拿着手机在城市空间移动,深入城市的多样化场景,通过拍照、摄像等方式重新设定了城市形象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凸显。潘霁、周海晏等的研究发现,在抖音的数据统计中,全中国热度最高的博物馆不是故宫,也不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而是“自拍圣地”——上海失恋博物馆。在这里,具有日常生活特性的以“爱的遗物”为主题的博物馆,战胜了以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为主题的传统博物馆,主要原因就在于抖音对城市空间的再现是以个体的参与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为首要特征的<sup>②</sup>。

① 曾一果:《从“怀旧”到“后怀旧”——关于苏州城市形象片的文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170—177页。

② 潘霁、周海晏、徐笛等:《跳动空间:抖音城市的生成与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10页。

文学艺术、大众媒介和新媒介对城市空间的再现并不是一种复刻,而是一种建构。这一过程反映了它的创造者与空间的关系<sup>①</sup>。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人为因素的渗透改变了人们对于城市的认知和人与城市的关系<sup>②</sup>。福柯所说的权力的运作与规训在媒介表征城市的过程中有着极为丰富的体现。例如,在大众媒介时代,由于绝大多数公众借由大众媒介的再现来认识和理解城市空间,大众媒介由此享有了塑造城市空间的“绝对权力”。假如大众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对公众进行信息误导,传播失实的信息,受众就有可能对城市空间和其所在城市产生恶性的刻板印象<sup>③</sup>。

聚焦媒介融合空间的传播学分析,主要关注不同媒介形态与城市空间的融合和互嵌。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手机、二维码、智能媒体等各种各样的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嵌入城市空间,与城市空间相互融合。这意味着新媒介技术不仅表征城市空间,还通过与城市空间的结合重构了城市空间。这一新现象的出现为从传播学角度研究城市空间提供了新的思路。

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麦奎尔指出,“日趋流动、即时并渗入城市空间的媒体集合,已经变成一个独特的社会体验模式的构成框架”,媒体已经无法被视为一种与城市相分离的事物;相反,“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经由建筑结构与城市领地、社会实践和媒

① [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页。

② 孙玮:《镜中上海:传播方式与城市》,《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63—170页。

③ 周凯、庄鹏:《城市形象推广的传播学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第139—142页。

介反馈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过程而崛起”<sup>①</sup>。因此,无论是考察城市空间,还是考察媒介,都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他将城市称为“媒介-建筑复合体”<sup>②</sup>,将嵌入城市空间的媒介称为“地理媒介”<sup>③</sup>。他指出,“地理媒介”的概念由四个彼此关联的维度交叉构成,即融合、无处不在、位置感知和实时反馈。其中,融合既指新老媒介的融合,也指中介化交往与直接交往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日益复杂、相互交织的关系;无处不在是指移动和植入式媒介及各类数字网络将媒介内容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网络连接嵌入城市空间,使城市空间成为媒介空间;位置感知指 GIS 软件、GPS 定位服务等提供了大量位置化的信息,从而形成了新的城市空间实践形式,甚至形成了新的城市逻辑;实时反馈指一种多人对多人的反馈回环成为可能,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共时性体验,使得媒介与事件之间存在一种不确定性,并且全面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缝隙,带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多样化<sup>④</sup>。

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城市肇始之初,还是当前的智能城市、全球城市时代,传播与城市空间一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媒介技术发展得越快,城市空间的传播现象就越丰富,传播与城市空间的关联就越紧密。正如麦奎尔所言,当前的城市空间同时也是媒介空间。因此,在当前这一媒介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探索城市空间具有越来越凸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① [澳]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邵文实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② 同上。

③ [澳]斯科特·麦奎尔:《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潘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④ 同上书,第1—4页。

## 二、广场：传播密集型城市空间

拿破仑征服威尼斯之后在看到圣马可广场时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全欧洲最美的客厅。”客厅是家庭传播活动最为密集的地方。这意味着，在西方语境中，广场与城市社会交往存在密切的关系。无独有偶，怀特在论及城市空间时也赋予它极为特殊的意义。他认为，广场本身包括一个成功的城市场所应具备的全部资本要素<sup>①</sup>。沿着这样的思路，广场毫无疑问是西方城市中极为重要的公共空间。

中国古代城市也有广场，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的广场大多仿照西方广场的样式建设而成，所以，它们的精神内核也往往是中西融合的。要分析当代中国的广场，就必须要对西方广场和中国广场的发展展开溯源，由此方能理解当代中国广场这一城市空间的意义。

### （一）溯源与发展：广场作为西方城市公共生活的媒介

在西方语境中，广场伴随着城邦的出现而滥觞。根据芒福德的研究，在古希腊城邦还未成形时，广场便已经在古老的希腊乡村展现了雏形，作为村庄老人们聚会的空间而存在<sup>②</sup>。广场真正的发端与发展也嵌于古希腊城邦的发展历程。

在古希腊城邦，广场最初只是“市内一块空旷无人的公共场所，围绕在圣殿周围或在重要的十字路口”<sup>③</sup>。随着城邦的不断发

① [美]威廉·H. 怀特：《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叶齐茂、倪晓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②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③ [法]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